

# 物价与生产

(英) 海 約 克 著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418807



# 物 价 与 生 产

(英)海約克著

滕維藻 合譯  
朱宗風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年

FRIEDRICH A. HAYEK  
PRICES AND PRODUCTION  
GEORGE ROUTLEDGE & SONS, LTD. LONDON, 1935  
根据英国乔治·路特莱治父子公司1935年增订第二版译出

物 价 与 生 产

(英)海 约 克 著

滕维藻 朱宗凤合译

\*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01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 850×1168 公厘 1/32 印张 8 9/16 字数 76,000

1958年11月第1版

195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统一书号：4074·249

定 价：(9) 0.43 元

封面设计：任 意

## 目 次

|                                       |     |
|---------------------------------------|-----|
| 第二版序言.....                            | 1   |
| 譯者序.....                              | 7   |
| 第一講 闡明貨幣对物价影响的各种理論.....               | 11  |
| 第二講 消費者貨物的生产与生产者貨物的生产之間<br>的均衡条件..... | 33  |
| 第三講 物价机构在信用循环进程中的作用.....              | 59  |
| 第四講 贊成与反对“彈性”通貨的緣由.....               | 86  |
| 重要譯名中外文对照表.....                       | 107 |

## 第二版序言

本書得以問世，是因為倫敦大學邀請我在1930—1931的學期中對該校主修經濟學的高年級學生作四次講演，本書初版時的形式，就是一字不變地轉載了這幾次的講演。那次對我的邀請，可算是一個很難得的机会，使我得以向英國的聽眾發表我想要對理論經濟學當時正在進行的討論應提供的意見；在我接到這個邀請時，適逢我對工業波動理論的輪廓已經形成了清晰觀點，但還沒有仔細鉅研它的全部細節，甚至還沒有了解到這種鉅研所具有的一切困難。而且，我的闡釋只限於我在四次講演中所能說的那些話，這就無可避免地導致了失之過簡的弊病，甚至比我在其它任何場合里可能會犯的類似弊病更要大些。雖然我現在認識到我的闡釋有許多缺點，甚至比我在本書初版時所認識到的缺點還要多，但我對那些具有一種不可抗拒的誘惑力、使我比在另一種情況下更能早日把我的見解發表出來的那種情況，只能深深地感到滿意。為了使以後的闡釋更加圓滿，我希望從本書出版所引起的批評和討論中所得的益處，會比僅僅我自己繼續研究這些問題所得的益處要多些。但是，要對這些問題作出更透徹的論述的時候還沒有到來。或許正是我從初版獲得的那些主要收穫，才使我了解到：在我想對本書所討論的一些主要問題作出更進一步的闡明之前，必須在我試圖建立起來的那個基礎上，花費一番功夫。在這本書里，我自由

地大量吸取了“奥国学派”資本理論的一些主要命題，但一些科学界人士并不象我这样愿意把它們認為是当然的命題。根据我和他們的接触，已經証明：并不是那些命題有錯誤，或者，就我运用这些命題所要完成的任务來說，不如我所想象的那样重要，而是这些命題需要更詳細地加以发展，使其更密切地适应实际生活的复杂情况，然后它們才能够提供一个完全令人满意的工具，来解釋我运用这些命題来研究的那些特別复杂的現象。这个任务必須着手进行，然后本書中所叙述的那些論題才可能有利地繼續向前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当有人对这本书提出再版的要求时，我感到既不准备把它加以重写和扩充，以致必須对其中提出的諸問題作出一个完全充分的論述，也不准备讓它以完全不变的形式重新問世。原版的說明过于紧縮，引起了許多不必要的誤会——如果論述稍为充分一些，这些誤会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以致某些增补似乎是迫切需要的。因此，我选择了一条中間路綫，那就是：总的說来未加改变，只在原書最必要的地方插入一些进一步的說明和推敲。这些增补有很多已經包括在德文版中——这个德文版是在英文初版发行数月之后問世的。其余的增补是从近三年来我为了发展或辯护本書中的一些主要論点而写的一系列的論文中摘录出来的，不过不可能把我在这些論文中所作的进一步的闡明通通都編入这本书里。凡是愿意参考这些論文的讀者，可以在下面脚注所列举的讀物中找到它們。<sup>①</sup>

我希望这些修改至少已經消除了本書初版中所出現的一部分困难。其它困难是由于这一事实，即这本书在某些方面是我在別的出版物里已經开始了的一种論証的繼續，而那些出版物在本書初版問世时，都只是用德文刊行的。現在那些文章已陸續用英文

譯出刊行，<sup>②</sup>讀者可从中找到我在下面的討論中含蓄地而不是明顯地談到的一些假設的解釋。

不過我充分了解到，這本書對大多數讀者所呈現的一些實際困難，是不會因這些修改而消除的，因為這些困難是和我所採用的說明方式分不開的。除了另寫一本全新的書來代替這一本外，我在这方面所能作到的，只是預先提起讀者對這個特殊困難的注意，並解釋所以必須採用這個導致困難的說明方式的原因。這一點之所以更加需要，是因為這個說明方式帶來的無法補救的缺點，比其它任何單獨一個問題所造成的誤會還要多些。

簡單說來，問題的關鍵是這樣的：由於考慮時間的關係，使我不得不在這几講里同時討論伴隨著資本數量變化而來的生產結構的實際變化和引起資本數量變化的貨幣機構。這只有在高度簡化的假設條件下才有可能——這種假設就是使得對資本品的貨幣需求，按照由它所引起的對資本品總需求的变化而發生相應的变化。我們現在所說的這個對資本品的“需求”，就它能夠決定資本品的價值這一意義來講，當然不僅僅是指，甚至主要地也不是指表現在任何市場上的需求，也許在更大的程度上，是指把資本品繼續保留

---

① “貨幣的純理論——對凱恩斯先生的再答辯”，“經濟學”1981年11月号；“貨幣與資本——對史拉發先生的答辯”，“經濟學雜誌”1982年6月号；“資本的消耗”，“世界經濟資料”1982年7月号；“論‘強迫儲蓄’理論之發展”，“經濟學季刊”1982年11月；“商情預測研究之現狀及其前途”，見“斯比托夫紀念論文集”，慕尼黑，1983年版；“論中性貨幣”，“國民經濟學雜誌”，第4卷，1983年10月号；“資本與工業波動”，“教理經濟學”，第2卷，1984年4月号；“論投資與產量之關係”，“經濟學雜誌”1984年6月号。

② “貨幣理論與商業循環”，倫敦，1938年版；“儲蓄異論”，“經濟學”1981年5月号。

一个时期的需求或愿望。关于对資本品的总需求和某一时期中在市場上表現出来的对資本品的貨幣需求之間的关系，是不能作出一般性的陈述的；就我所要討論的問題來說，这个数量的关系实际上究竟是什么，也并不是特別有关系的事。不过，对于我所要达到的目的來說，最重要的是要強調这一点，即对資本品的貨幣需求的任何变化，不能認為只是在有关新資本品的某些专业市場上才能感觉得到的变化，而仅仅應該理解為一种能够影响資本品的一般需求的变化——这种变化乃是維持某种生产結構的过程的一个基本方面。在这一方面，过去我所能作出的最简单的假設是：假定在資本品的貨幣需求和总的需求之間的关系是固定的，从而使在一个单位時間內，花費在資本品上面的貨幣数量等于現存資本品的价值。

我此刻仍然認為对我所要达到的主要目标很有用处的这个假設，在其它两个并非不重要的方面，頗易令人发生誤解。首先，这个假設使我們对于耐用品不能作出足够的論述。我們不可能假定，一种耐用品所具有的、并且等待使用的潜在效能，是按照一定的時間間隔在轉手。这就是說，单就討論貨幣机构的那个特殊例証來講，我只得把耐用品置而不論。我并不感到这是一个太严重的缺点，特別是我感觉到——我想这并不是沒有根据的——流动資本所起的作用頗受到人們的忽視，因此，当这个作用与固定資本的作用相提并論時，我就着重地把它提出。但現在我了解到，我当时應該預先声明，我之所以采取这个假設的正确理由和它所起的作用，并且，我深怕第一版中的那个脚注（第 37 頁，注 2。这个脚注是当我注意到我的論証可能引起疑難時最后加进去的）不但沒有起了澄清这个观点的作用，反而把它弄混乱了。

关于各个长短相等的生产“阶段”这一假设，它的第二个影响就是使我对货币流通速度问题不得不作出带有几分片面性的论述。它或多或少地暗含这种意义，即货币以不变速度通过各连续阶段，这个速度相当于货物通过生产过程前进的速度；然而这种论述从未考虑到流通速度的变化，或者各个不同阶段所保留的现金余额的变化。在维持这个假设的条件下，由于不可能对于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特地予以讨论，就容易加强一种错误的印象，以为我所讨论的那些现象，并不是由于货币总流量的每一变化，而只是由于货币数量的实际变化所引起；但在实际生活中，由于流通速度的变化所引起的货币流通总量的变化，至少是和由于实际数量的变化所引起的情况一样地常见，如果不是次数更多的话。有人对我说，对于任何货币问题的论述，如果象这样忽视了保留货币余额的意愿发生变化的现象，那就不可能做出什么有价值的论述。虽然我認為这种说法有些言过其实，但我在这方面要着重地指出，全部货币理论领域中，只有很小的一部分在本书中得到认真的讨论。我的全部要求就是，希望讨论大概比旁的任何理论更被忽视和误解的那一个方面；由于对它的认识不够，曾经引起了特别严重的错误。把这个论证同货币理论本体结合起来，是一个尚待着手进行的任务，也是一个我在这里还不能够和未曾着手尝试的任务。但是我或许可以再说一句：就货币的一般理论（有别于资本的纯理论）而论，在我曾试图作出一个特殊论点的那个范围内，密塞斯教授的著作<sup>①</sup>远比维克塞尔的著作更能提供一个理论的轮廓。

除了感谢这个伟大的智慧的惠赐以外，我还要重复在初版序言里所提到的：不仅对资本理论领域的伟大传统——这个传统是和哲逢斯、龐巴卫克、维克塞尔的名字分不开的——，而且对于帮

助我准备这些演講的諸君，尤須表示我的特殊謝忱：目前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哈特先生，当我草拟这几講的英文原稿时，他的建議使我受益不少；特别是洛宾斯教授，他在本書初版发行时，花了許多功夫把原稿整理成为一种适合出版的形式，并一直照料它直至印毕为止，同时关于我所写的一切英文出版物，包括本書的第二版在內，他一向給我以极慷慨的帮助，对此我尤表感激。

哈約克

倫敦政治經濟学院，1934年8月。

---

① 特別參閱他的“貨幣與通貨原理”，1912年初版，現在幸而從它的英譯本還可看到：密塞斯，“貨幣理論”，倫敦（約拿散角），1934年版。再參閱我的“貨幣理論與商業循環”，倫敦，1933年版；它比本書更多地涉及引起商業循環的各項貨幣因素，而本書主要是談到構成商業循環的實際現象。

## 譯 者 序

在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两个体系斗争的条件下，現代资产阶级經濟学家为了完成替資本主义制度辯护的阶级任务，发表了各式各样的經濟“理論”；尤其是資本主义总危机时期中震撼着搖搖欲墜的資本主义制度的經濟危机問題，更成为资产阶级經濟学家集中注意力、企图加以粉飾，以便欺騙劳动人民的一个主要对象。現在出版中譯本的这本物价与生产，便是現代有影响的资产阶级經濟学家海約克的危机論的主要代表著作。

海約克原籍奥地利，本世紀二十年代曾任奥国經濟研究所所长及維也納大学經濟学講師。一九三一年迁居英国，任倫敦大学經濟学教授，长期来成为保守党經濟問題的主要理論家之一；四十年代末，他又迁居美国，当了芝加哥大学的教授。海約克和洛宾斯等一批资产阶级經濟学家(即有时被称为所謂“倫教学派”)和保守党有密切联系，他們重新搬出“奥地利学派”的陈腐理論作为武器，来拚命反对馬克思主义并肆意詆毀苏联和社会主义制度——尤其是社会主义的国民經济計划化。他們頑固地为資本主义的私人所有制辯护，露骨地主張向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进攻。

海約克在“物价与生产”这本論述資本主义經濟危机的書中所提出的基本論点是这样：首先他把由于資本主义制度內在矛盾所产生的經濟危机，認為是由于利率变动(“货币利率低于均衡利率”)

所引起的信用貨幣膨脹的結果，于是貨幣供給量的擴充成為導致危機的決定性因素。海約克認為危機的發生直接是由于所謂生產結構的縮短，當由于自願儲蓄引起生產過程的延長時，可以達到平衡；而當由于增加貨幣供給量發生所謂“強迫儲蓄”現象，其所引起的生產過程的延長則不能長久維持；當增發貨幣成為人民收入而使消費需求增加時，將使消費者貨物價格上漲，生產資本品無利可圖，不可避免地引起生產結構的縮短，而發生經濟危機（見本書第二第三兩講）。海約克的推衍方法是從一個假定的均衡狀態——即一切生產后备力量（包括勞動力）已經完全利用的狀態出發，分析利率變動和信用伸縮如何影響到消費者貨物 and 生產者貨物的相對需求和生產結構，杜撰出一種實在十分荒謬的論斷，即由于所謂“消費過度”（消費需求的過分增長）引起的消費者貨物生產的增加，反而引起對生產者貨物的需求的降低和生產的無利，強迫使生產過程縮短而引起危機。因此海約克的“反危機”方案除了主張降低工資外，又提出所謂“中性貨幣”政策（見本書第四講），認為生產量和貿易量的增加，不能成為增加貨幣供給量的理由，也不主張用增加貨幣數量作為反蕭條的手段，“貨幣供給量的任何變動，除非為了保持中性貨幣所必要的限度以外，都是有害的。”

不管海約克在這本書中用了許多迷惑人的抽象思維和晦澀的辭句，使有些人覺得莫測高深甚至望而卻步，也不管資產階級保守派及其經濟學家對它如何稱道和推崇，這本書的邏輯推理和論斷之站不住腳以及其為資本主義制度辯護，掩蓋經濟危機真相的企圖，却仍是非常明顯的。首先，海約克把信用貨幣的伸縮誇大為再生產過程和影響工業生產波動的決定性因素這一點是沒有任何根據的。危機是從資本主義生產本身所包含的基本矛盾中產生的，

因此任何一种货币信用制度及其措施不能成为产生危机的本质原因，相反地，信用发展的规模和分配主要是生产过程和再生产过程发展的结果。因此企图使货币流通总额保持不变的所谓“中性货币”政策、即企图用防止工业的扩张和活跃从而防止危机到来的政策（且不說这一点在实际上能否做到），必定是心劳力拙，注定要失败的。其次，海约克的论点建立在这样一种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假定上，即假定所有“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均已完全利用（“充分就业”），因而他才认为增加消费者货物的生产，必定要减少生产者货物的生产。事实上在资本主义总危机各发展阶段上，都不存在这种情况，正相反，现在企业经常开工不足和慢性失业已成为经常现象，海约克的这一虚伪透顶的假定，目的无非是在掩盖资本主义制度不可能充分有效地利用现有生产力这一基本事实，而建立在这个虚伪假定上所推衍出来的结论的正确性如何，也就不问可知道了。再次，海约克把所谓“消费过度”（消费需求的过分增长）视为产生危机的根本原因这一点，也是完全错误的。他连一些肤浅庸俗的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谈的“消费不足说”也认为不够“正统”，闭着眼睛不看资本主义社会中购买者的基本群众——劳动人民的消费需求落后于生产增加这一现实，硬说资本主义制度下个人消费的过分增长超过生产结构所可负担的限度，因而给扩大再生产带来危机。事实上消费者货物生产的扩大，不但不会减少资本品的生产，反而会刺激资本品的生产。海约克杜撰的所谓消费者货物生产的过分增长限制资本品生产增长的可能性这一说法，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情况正好相反。最后，海约克的危机论的阶级本质，无非是万变不离其宗地为垄断资产阶级进攻工人生活水平的企图捏造“理论基础”：既然工人阶级消费需求的增加

只能使經濟危机尖锐化,所以只有通过降低工人实际工資的办法,才能防止和挽救危机。不管海約克脫得如何天花乱墜,并把自己装扮成所謂公共福利的保护者,但他的論点是荒謬的,他为资产阶級利益辯护的面目是很鮮明的。

海約克这本书是在本世紀三十年代初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資本主义总危机已进入新的阶段,资产阶級經濟学的論客們为了卫护他們的主子的利益,在危机理論方面又有不少新的詭辯,但本书的出版,仍可供讀者作为了解和分析批判海氏这一学派的謬論的資料,譯文內容有不当和錯誤之处,敬請讀者見告以便改正。

## 第 一 講

### 闡明貨幣对物价影响的各种理論

“他深悉貨幣的充斥使百物昂貴，但他不會分析物价究竟是如何上漲的。这种分析的最大困难在于发现：貨幣数量增加时系通过什么途徑和按照什么比例使物价得以提高。”

坎蒂戎(1734年逝世)，

“論商業之特性”，II, 6.



(一) 貨幣影响对于稳定生产量和生产方向起着支配作用。这个真理，对于当前一代人来说，也許比在任何时候的人都更为熟悉。世界大战和战后通貨膨脹的經驗，以及恢复金本位制度(特别是象英国那样，通过紧缩通貨来恢复金本位)的經驗，充分証明了每一生产活动对于貨幣的依存关系。近年来关于稳定貨幣价值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广泛討論，主要是由于普遍承認上述事实的結果。目前不少有識之士認為，当前世界規模的經濟蕭条的原因是由于黄金缺乏，因而想从貨幣方面寻求克服經濟蕭条的手段。

然而，如果有人問：这些年来，或者至少直至最近以前，对于貨幣与物价关系的理解是否已有很大进步呢？或者說，有关这方面的

为大家所普遍接受的原理，是否已经进步得远远超过百年以前的人所共知的原理了呢？我个人的答案是倾向于否定的。这样说似乎是难以理解的，但我想，任何曾经研究过十九世纪前半期货币理论文献的人都会承认：当代货币理论中几乎没有任何观念为那时学者们所不知道的。现今大多数经济学家也许会这样辩解：进步很微的原因是由于货币理论已经达到如此完美的境界，以致再要前进一步就不得不缓慢的。但是我却认为事情似乎是这样的：在货币理论范围内，某些最根本的问题，尚未获得解决，某些公认的理论，其正确性还大可怀疑；甚至那些早期学者的著作中已经提示过的改进建议，我们也并没有能够加以发展。

果尔如此——我固希望诸君确信如此——，则过去十五年的经验不曾使我们有更多收获这一点，确是有点令人惊奇的。从前货币混乱时期，往往也就是经济学的这一分支有重大发展的时期。十六世纪的意大利被叫做货币情况最糟而货币理论最好的国家。如果近年的情况并非恰好如此，我认为原因似乎在于大多数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学特有的方法论在态度上有某种改变——这种改变常被人誉为一种重大的进步——，我指的是试图用数量研究方法代替质量研究方法。在货币理论范围内，甚至那些通常摒弃“新”观点的经济学家也不免这样。有些人实际上在数量分析法到处流行以前若干年已经如此转变了。

（二）最知名而又与此最有关的例子就是大约二十年前费歇尔在其有名的“交易方程式”中，恢复了更加机械式的关于货币价值的数量学说。这个学说，以用作统计证明的数学公式为工具，是所谓“数量经济学”的典型范例，而且它对这个学派的当前代表人物的方法论确有很大影响。以上这些看法似乎都是不容否认的。

我并无意責難这个學說的正面內容，我甚至準備承認：就它本身而論，它是对的，并且從實踐觀點看，如果公眾竟再不相信數量學說的基本命題的話，這將是我們所遇到一件最糟的事。我所要抱怨的，不僅是各種形式的數量學說不適當地竊據了貨幣理論的中心位置，而且這個學說所根據的觀點確乎阻礙了貨幣理論的進一步發展。目前把貨幣理論和一般經濟理論的主體相隔絕的這種狀態，就是這一特殊學說為害匪淺的結果。

因為只要我們使用不同的方法來解釋那些不考慮貨幣影響時的價值本身，以及解釋貨幣對各種價格的影響時，就必然產生上述後果。而且，如果我們試圖在貨幣總量，一般物價水平，乃至生產總量之間建立直接的因果關係時，事情也依然是這樣。因為上述各種總量本身對個人的決定從不發生影響，然而貨幣以外經濟理論的主要命題卻正是以知悉個人決定的假設為基礎的。正是借助於這種“個人分析”法，我們才能對我們所獲致的經濟現象有所了解。現代“主觀派”理論在其使用範圍之廣泛上已遠遠超過古典學派，這也許是較其學說本身更為優勝的主要之點。

因此，如果貨幣理論仍然試圖在種種總量或總平均數之間建立因果關係，這就表明貨幣理論落後於一般經濟學的發展。事實上，無論各種總量之間或各種平均數之間都不能相互起作用，亦不可能在它們之間建立必然的因果關係——象我們在個別現象、個別價格等等之間所能夠做到的那樣。我甚至还認為：按照經濟理論的本質來看，平均數根本不能構成理論推理的一個環節，但是要證明這個論點，將超出我演講的題目太遠了。此處我將只限于試圖說明：在經濟理論的一個特殊領域內，運用這些概念和不運用這些概念來進行解釋時，究竟會產生什麼差異。